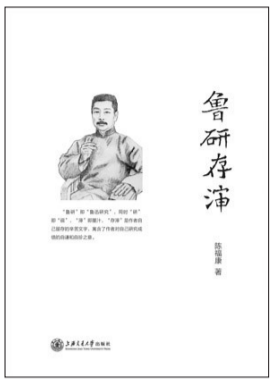


## 鲁研旧作尽新意

■柳和城



《鲁研存浦》，陈福康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第一版，58.00元

“鲁研”，即鲁迅研究。鲁迅始终有说不完的话，鲁研也永远有讨论不完的课题。福康兄这部《鲁研存浦》(以下简称《存浦》)是他三十余年鲁研成果的汇集，集了他鲁研的大部分作品，我有些读过，有些是第一次获见。不论是已读还是初读，都有新鲜感，因为我也是一个“鲁迷”，鲁研研究第一次把我引入文史殿堂，成为一名弄文字的人，直到如今。

福康兄取这样高雅的书名，颇有深意。《前言》中他解释道：“在古文中，研又通砚；浦就是墨水。”“存浦”是作者自己留存辛苦文字，寓含了他对自己研究成果的自谦和自珍之意。全书四卷，分别为专论、杂考、商榷与批驳。专论篇幅最长，约占一半以上。其中开卷首篇《永铭在心的一段人生经历》，即他参加2005年《鲁迅全集》修订工作参与纪事，读来令人感动。2006年他撰写这篇长文之时，正逢老母亲因脑出血昏迷不醒，他奔走陪伴并护理一个多月，终于未能挽回老母的生命。在如此沉重打击下，他一面做好本职工作，一面将人生中这段重要历程写下来。我们可以从中知晓《鲁迅全集》修订工作之艰辛与复杂。

文史研究是科学，讲究创新，提出新问题，发掘新材料。《全集》修订原有注释，就是个创新过程。福康兄很多意见均被采纳，有简单的，也有较复杂的。如第五卷旧版“礼拜五派”，注释为：“是当时进步文艺界对一些更为低级庸俗的作家、作品的讽刺说法。”新版则补充为：“1933年3月9日，鲁迅、茅盾、郁达夫、洪深等人聚会，茅盾提到‘一批所谓文人，有礼拜六派的无耻，文章却还是礼拜六派的好，无以

名其派，暂名为礼拜五’，大家大笑一致通过。(见1933年3月11日《艺术新闻》周刊)鲁迅的文章发表于这年4月，可知他是及时用了这一新的“文坛掌故”。如“哥伦布”旧版仅注“美洲大陆的发现者”。陈福康提出应加上“被称为”三字，因国内外学者都有人认为，哥伦布并非第一个到达美洲。又如鲁迅《为翻译辩护》一文提到达尔文《物种由来》的两种日文译本，“先出的一种颇多错误，后出的一本是对的”。旧版没有注明日文翻译的究竟哪两种，事关鲁迅进化论思想来源，有关系到达尔文著译在中国的传播，福康兄心细如发，一一查明版本，加入新注。鲁迅文内用字从来研究者并不注意，陈福康发现《全集》第五卷《诗和豫言》，“豫”字颇为奇怪，为什么不用通常的“预”呢？他查了该文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时和收入《准风月谈》，这个题目及文章内的“豫”字均作“预”。可能是1938年版《鲁迅全集》校对者误以为鲁迅只用或沿用“豫”，故而硬改称“预”，因此应当改过来。

当然，修订中常有分歧，争论是免不了的。据作者自己说，讨论中免不了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虽然有时火气大了点。如《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该不该收入《全集》，争论相当激烈。原件至今没有发现，但有当年苏区报纸及中共领导人等文章为证，陈福康能列出一连串的“证据链”。因此他坚持主张将此信列入“附录”。可有不少朋友当面或撰文与其争辩，提出“种种疑问”。最后在他与其他参与修订工作的专家们一致同意下，该文终于当做“附录”被收入《全集》。又譬如，鲁迅《冲》一文用到“年方花信”一语，旧版注释云：“指女子正当成年时期。花信，花开的消息。”福康兄认为，古有“二十四番花信”之说，“花信”指女性二十四岁，注释应该明确说明。编委会讨论时，有人翻遍《辞海》《汉语大词典》等工具书，均无这一解释，意见被否定。他不气馁，继续寻找“书证”，终于在清人戴虞保的诗词等古书中找到“花信”专指二十四岁女性的根据。然而，材料寄到出版社，却仍未被编辑采纳，这就有点令人遗憾了！

陈福康有些意见未被采纳，只要他觉得没有道理的，他就表示“不服”。如《汉文学史纲要》，原是鲁迅1926年在厦门大学讲课的讲义，题为《中国文学史略》，次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授同一课程时，曾改题《古

代汉文学史纲要》。鲁迅生前并未正式出版，1938年编入《鲁迅全集》时改用现名。其实“古代”二字不能少，因为此书明明从上古开始写到的西汉为止，“汉文学”可以理解为“汉朝的文学”，也可以理解为“汉民族的文学”。陈建议仍采用鲁迅用过的题目，是有道理的。再如鲁迅的一些诗作，原先没有题目，后人加上去的，不一定贴切。有不同意见很正常，学术争鸣么，先入为主不得。

福康兄用平实的文字记录下参加《鲁迅全集》修订工作的点滴，我丝毫没有看出他为参与过这项重要工作的得意，只看到他的认真和勤勉。曾听《存浦》的责任编辑说起，或谓该文涉吹捧自己之微词，我仔细翻阅，仍未读出诸公之感。在我看来，这篇文章实属研究《鲁迅全集》编史的有用文献。

《存浦》中的文章不同于某些应景文章，过眼烟云，经不起咀嚼。我对于几篇有关鲁迅翻译成就的作品，很感兴趣，很受启发。《周氏兄弟的译论》与《鲁迅对译学的大贡献》二文，较系统地阐述了五四前与五四后鲁迅翻译主张的发展历程。我不敢说是否发他人之未发，至少我看到这方面有分量的文章不多，此为突出的两篇。

周氏兄弟是清末介绍和翻译欧洲新文艺的先驱者。鲁迅1902年3月去日本留学，1903年开始翻译活动。最初是从日文转译雨果的随笔《哀尘》和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小说《月界旅行》等。周氏兄弟当时积极从事翻译外国文学的同时，提出了一些译学见解，成为清末文学理论拓荒的重要组成部分。《摩罗诗力说》是鲁迅1907年，26岁时撰写的一篇重要论文。1908年3月以“令飞”笔名发表于《河南》杂志第2、3期，后收于《坟》。该文内容复杂深广，鲁迅后来自己也承认因受章太炎影响，用了许多古怪句子与古字，比较难懂。所谓“摩罗诗派”，即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积极或革命的浪漫主义流派。“摩罗”一词，借于佛教用语。陈福康把鲁迅文章中提出“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思想概括出来，让人容易读懂理解。还有鲁迅《月界旅行·辨言》里“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的观点，主张直译等等，经过提炼说明，一目了然。1927年后，鲁迅的翻译论述更为丰富，《存浦》作者总结出“关于翻译的目的与宗旨”“关于‘直译’与‘硬译’”“关于翻译的语言、语词问题”“关于直译(转译)和复译问题”“关于翻译批评问

题”，洋洋洒洒数千言，至今读来仍有新意。譬如鲁迅把翻译比作普罗米修斯“窃火”，同时还为了“煮自己的肉”，这些话虽然很多人引用过，现在有人又从鲁迅的译学贡献角度加以阐述，值得点赞！

《存浦》卷二杂考类，读来更为有趣，一些过去人们极少注意的事情，陈福康注意了。《鲁海偶拾六则》第一则《鲁迅在民国第一天》，1912年1月1日民国第一天，鲁迅在干什么？几种《鲁迅年谱》都为空白。陈在1936年元旦出版的《宇宙风》半月刊孙伏园散文《第一个阳历元旦》中，欣喜地发现一条材料。当时孙在绍兴初级师范学校读书，校长周豫才即鲁迅。文章写道，民国元年的新年，“阴历十一月十三日的午饭时分，我们的学校得到了消息，说‘革命政府今日成立于南京，改用阳历，今日就是阳历的元旦’……午饭以后，校长周豫才先生召集全校学生谈话，对于阳历的区别，及革命政府以采取阳历的用意略有说明，末后宣布本日下午放假以表庆祝……”孙伏园这段回忆虽然简略，但生动地说明了鲁迅当时确实以极大的兴奋喜悦心情迎接中华民国的成立。陈福康的新发现，不知是否已经补入新版《鲁迅年谱》？

再如“马郎妇”典故，《太白》刊月“辩证”，“幽闭”小考，令人信服。鲁迅在杂文《病后杂谈》中提到中国古代一种对妇女的酷刑“幽闭”，究竟是一种什么酷刑呢？古书记载比较简单，现代刑法史专著说法也不同，一般人都以为是“将女子关起来”。陈福康从明万历年间刊行的王同轨的《耳谈类编》等书中找到根据，指出是一种极其惨无人道的刑制，正如鲁迅所说“凶恶，妥当，又合乎解剖学”，鲁迅学过医，懂得解剖学原理，也读过《识小录》，所以在他的杂文中顺笔对封建统治者加以无情揭露，一针见血。

卷四批驳栏中数篇有关周作人的文章，对所谓“新史料”失实问题详加考证，实事求是，不唯上，不迷信权威，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笔者以为这些文字至今具有很强生命力，值得研究者重视。

《存浦》作者读书广博，记忆强健，思考缜密，令人佩服。如果说有什么不足的话，我认为，既然是旧作新集，那么每篇原刊何处，篇后应该标明，这也可以省去篇中某些夹注说明，新的材料补充作为“附记”处理则很好。

## 校勘精审，笺注详密

——《杨炯集笺注》评介

■马婧

杨炯出生于军将之家，幼即聪敏博学，善属文，以其雄奇雅健之作品，成为“初唐四杰”之一。留存至今的《盈川集》十卷，凡诗赋各一卷，骈文八卷，整肃雄浑，格局廓大，用典繁密，在六朝至唐代诗文体制演化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但阅读障碍不小，引书既杂且偏，造语奇特，形同谜语，笺注困难重重。四杰中王勃、骆宾王，早有清人为之作注，卢集也有新整理本行世，惟杨集以其笺注之难，长期以来未见有疏解典文、便于阅读的整理本，仅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徐敏霞先生点校本，以及傅璇琮先生《杨炯考》《杨炯简谱》，张志烈先生《初唐四杰年谱》等少数几种成果。今祝尚书先生历时数年之力，继笺注卢氏笺集之后，撰成《杨炯集笺注》，注释详密，征引丰富，对杨炯诗文所用典故深加考索，多有发明。又搜集杨炯残文断句、传记逸事、著录序跋，并新编年谱，附载于后。

《杨炯集笺注》的优点首先体现在校勘精审上。现存杨集乃明人重辑本。由于时代久远，屡经散聚，文字错误甚多，聊胜于无，实难称善。当年杨炯身故，文稿由宋之间保存编集，《旧唐书》著录为三十卷。经唐宋五代战乱，至南宋初见公武撰《郡斋读书志》时，已佚为二十卷。元代修《宋史·艺文志》，所见二十卷之外，尚有《拾遗》四卷，此后也完全散佚。直到明代约弘治、正德间，有题名《杨炯集》的上下两卷传世，仅载诗赋。万历年，童佩重辑为《盈川集》十卷、附录一卷，即后日《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初编》所收之本。此次整理，虽仍以童佩本为底本，没有采用打乱编次重辑的方式，但实际上所做工作同于重辑，不仅对校了明代张燾《初唐四子集》本、张逊业辑《唐十二家诗》本、铜活字《唐五十家诗集》本、清项家达本等，而且参校《文苑英华》《唐文粹》以及宋人类书等等，充分利用《英华》所保留的宋本校勘成果，参校各书，熔校勘与考证于一炉，尽力追索底本的原始出处。

如卷三《登秘书省阁诗序》“陶阴寡务，素素多闲”句，“阴”原作“泓”，祝先生考曰：“《英华》卷七一五于‘泓’下校：‘集作阴。’今按：‘陶泓’一词，首出韩愈《毛颖传》，谓砚也，初唐前无其语。《北堂书钞》卷一〇一《艺文部·刊校谬误》以‘陶为阴’条引刘歆《七略》云：‘古文或误，以“典”为“与”，以“陶”为“阴”，如此类多。’则“阴”为“陶”之错字(今按：繁体“阴”典“陶”形近)，作“泓”乃后人妄改。《英华》所校本是，兹据改。‘陶阴’即以‘陶’为‘阴’，此用如幼词，指校勘辨正文字。陶阴寡务，谓校勘书籍，其事不多。”如果没有祝先生的考证和疏解，读者直读作“陶泓”，真不知所云。

又如卷七《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述墓主王童长子王师本曾为韩王府祭酒，安喜县令，其下有“朝游楚泽，暮宿燕宫”二句与之对应，各本文字同。祝先生从李元嘉晋封韩王事入手，引《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知李元嘉于贞观十年(638)改封韩王，授潞州都督。但潞州何以有“楚泽”？这很可疑。祝先生于是考《元和郡县志》卷一五《泽潞节度使·泽州》道：“汉为上党郡高都县之地也。后魏道武帝置建兴郡，孝庄帝改置建州，周改建州为泽州，盖取泽泽为名也。”又引上书《泽州·阳城县》曰：“本汉渡泽县。……渡泽，在县西北十二里，《墨子》曰‘舜渔于泽中’。”则“楚泽”乃“渡泽”之误，解决了“楚泽”的疑点。于是，下旬“燕宫”也就迎刃而解了。《元和郡县志》卷一八《定州·安喜县》：“本汉卢奴县，属中山国。”再考《晋书·载记·慕容垂传》，慕容垂于建元元年(386)建后燕，都中山。则所谓“燕宫”，即代指安喜县，实指王师本为安喜县令事。安喜县在定州郭下，故云“暮宿燕宫”。上引两句，如果不能破解



《杨炯集笺注》，[唐]杨炯著，祝尚书笺注，中华书局2016年3月第一版，168.00元

楚泽之“楚”乃“渡”之误，碑文中的几句话就不可能读懂，当然也不可能正确地作注，可见文字校勘是古籍笺注的基础，极为重要。杨集底本文字错误太多，全书诸如如此的考索俯拾皆是。祝先生考证文字有如侦探破案，抓住线索，多方探求，收获丰厚。

《杨炯集笺注》的另一优胜之处，是笺注详密，征引丰富。杨集的阅读障碍，除来自文字错误外，尚有大量用典。杨炯六岁便考中童子科，也就是俗称的“神童”。至十一岁待制弘文馆之前，朝夕于太史局，随文生读书(见祝撰《年谱》)，反映在知识结构上，便是以儒家学术为主流，融会纬纬之学，对于星历、通甲、兵家之学极为熟悉。在创作中，他除了多引儒家典籍之外，也常涉猎术数，征引兵书，往往生僻难为人知，加之行文受制于偶僻骈体，难免牵率，因此一直以来的号称难读，故《盈川集》乏人作注，读者每以有感。祝先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即有志于斯役，但因工作关系，至2012年始专力为之，从此日孜孜，广搜细考，一一疏解，在引证考之外，又每每以简明的语言点明文意，摆脱了此类注释的常见之弊。

如卷二《奉和上元醮宴应诏》诗首句“甲子遇灾年”，祝先生笺云：“‘甲’指甲子岁，即隋文帝仁寿四年(604)；‘乙’指乙丑岁，即隋炀帝大业元年(605)。《隋书·天文志》曰《五代灾变应》：‘仁寿四年六月庚午，有星入于月中。占曰：‘有大灾，有大兵，有亡国，有破军杀将。’七月乙未，日青无光，八日乃复。占曰：‘主势夺。’又曰：‘日无光，有死王。’甲辰，上疾甚，丁未，宫车晏驾(隋文帝死)。皆兵丧亡国死王之应。’又曰：‘炀帝大业元年六月甲子，荧惑入太微。占曰：‘荧惑为贼，为乱入宫，宫中不安。’”按上引《隋书·天文志》下所记之隋代灾变，自甲子、乙丑始，以下尚有大业三年、十年、十二年、十三年等。句谓隋自甲子、乙丑隋文帝死、炀帝杨广继位起，即灾变不断，国运转衰。诸如此类，若非笺注，今人实在难以明其就里。应当指出，象这种难以解读的句子或词语，在杨集中比比皆是。

又如前注书有“注古典易，注今典难”的说法，意思是查找所用古书中的典故相对容易，而准确解读诗文中所涉当时的人与事(即“今典”)则很难。杨炯是初唐作家，其诗文涉及到大唐初高宗、武后两朝的政治、军事，以及职官、地理等方面的知识，对此，祝先生皆一一精心稽考，准确地予以笺释，大大缩短了今人与杨炯之间长达一千三百多年的时空距离。据估算，《杨炯集笺注》所注典故近千条，限于篇幅，以上所举例证真所谓挂一漏万。要之，为古书作注貌似容易，实则不仅要求对各篇作品及相关时事熟读于心，还要建立起与原作者相当的知识背景；不仅对其人其事作了如指掌，还要以恰当的方式，准确地传达给隔膜日深的当今读者，其间所费心力，盖倍于新撰研究性议论性文字。祝尚书先生积多年之力，日日尽心于此，终成这部一百二十余万字的巨著，对文献整理和保存，对读者研究者，皆善莫大焉。

## 程秉写的是《周易摘》

■陈鹤



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屏

时，也只是抄录《三国志》中的原话。所以，这三本书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据书名，后两书的意思比较明确，《尚书取》的意思是取正《尚书》，《论语摘》是摘取《论语》。按此逻辑推理，《周易摘》的意思应该是指摘《周易》，即挑出错误，加以批评。绝对不是“摘抄”“摘录”的意思。程秉为著作命名的方法，应该是从老师那

玄处学来的。《后汉书》卷35《郑玄列传》记载：“时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郑)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命名方法，师徒二人如出一辙。

此外，近代学术大师钱基博先生(1887—1957)在《经学通志》“周易志第二”中指出：“汝南程秉德祖者，逮事郑玄；吴大帝(孙权)闻其名儒，征拜太子太傅；著《周易摘商》，盖费氏(费直)之支流余裔矣！”实事求是地说，钱先生将此书书名题作《周易摘商》，也是不准确的。但将“摘”字理解为“商榷”“指摘”的意思，则无疑是正确的。

宋代学者也能正确理解程秉

学三书的含义。据宋人徐度(?—1166)的史料笔记《南窗纪谈》记载：“石林公(叶梦得)既为《春秋》书，其别有四：解释音义曰传，订证实事曰考，摭古(三传)曰疏，其编排凡例曰例。又问曰：‘吾之为此名，前古之所未有也。’”悼济(按：即徐康，字悼济，徐度之父)曰：‘已尝有之。’石林曰：‘何也？’悼济曰：‘吴程秉逮事郑玄，著书三万余言，曰《周易摘》(尚书取)《论语摘》，得无近是乎？’石林大喜。”

至于《周易摘》，历史上也确有其书，但这是清代学者顾颉刚撰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将该书作为存目，并评价值道：“《周易摘》五卷。国朝顾颉刚撰。禹号虚庄，南地也，钱先生将此书书名题作《周易摘商》，也是不准确的。但将“摘”字理解为“商榷”“指摘”的意思，则无疑是正确的。

脱韵，也同对译之英文术语 feudal 含义相左，且有悖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理论。当然，中国的“封建”、西方的 Feudalism，都不是固定不变的，都有其生成、演变的历史。但不管怎么变，都没有逸于其本义提供的引申指向和语义空间。而“泛化封建”偏离了概念名实措置，引发历史叙事的混乱，所谓“削足适履”，“语乱天下”。

有鉴于此，笔者建议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皇权社会”指称中国秦汉至清的社会形态与时段，庶几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 广义、狭义和泛化的封建论

(上接第9版)

泛化封建论虽然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渐居主导地位，但与此相辩难的言说也不绝如缕。这些非泛化封建论者约分三类：一为持中国传统史学观点的学者(如钱穆)；二为持欧美主流史学观点的学者(如费正清)；三为马克思主义学者(如王亚南)。他们试图将“封建”的古汉语本义与西义相通，从世界历史多元发展的视角，观察中国古史，展开古史分期。他们的封建观同样富于学理的阐发，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影响。他们虽非主流，但不可忽视。缺少上述非泛化封建论，二

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封建”用语状态便是不完整的。他们的真知灼见，正是我们今天重新界定“封建”“封建制度”“封建社会”“封建时代”的丰厚历史资源与坚实前进基地。

通览马克思、恩格斯论著可发现，历史唯物主义者明确反对泛化封建观。马克思、恩格斯是从西欧中世纪的社会存在中概括出封建主义特征的，其特征包括：1.人身依附；2.土地不可让渡；3.超经济剥夺；4.政权分割；5.等级制。大体符合这些特性的社会，便可称之为“封建社会”，否则当考虑另立名目。绝大多数西

方史学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绝不把中国、印度的前近代社会以“封建制”相称，原因正在于此。也正是基于对“封建”概念的厘定，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将封建主义视为西欧的专有物，对于与西欧中世纪社会形态类似的古中日本，他们也不止一次地以 feudalism 相称。但编修马克思、恩格斯所有关于东方中古中古代形态的论述，却无一处以 feudalism 指称印度、中国等其他东方国家，他们历来把前近代中国、印度称之为“东方专制社会”。

综上所述，泛化“封建”既与本义